

2012

贺县文史

第七辑



政协贺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封面提字：钟家佐
封面摄影：覃光荣
责任编辑：谢贤青 陈旭

贺县文史资料
第七辑
政协贺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出版
阳朔县印刷厂印刷

目 录

- 一、贺县、信都县解放情况……………王思林（1）
- 二、原平乐专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狮子岗农业生产合作社……………莫官济、钟声（6）
- 三、回忆罗奋平同志……………吴 动（11）
- 四、在广西学生军生活的日子里……………陈赐珍（14）
- 五、莲塘夙儒谢公挺……………谢寿田（18）
- 六、我国百家姓的“郡”名……柳继乙稿、陈兆富整理（22）
- 七、新路矿概史……………余细利（34）
- 八、县长徐 居其人……………刘声彪（35）
- 九、黄田市况话当年……………张旭明（37）
- 十、中美瑶族文化之异同……………邓元东（39）
- 十一、张廷辅其人其事……………莫官济（47）
- 十二、忆在桂岭“大生文具店”活动片断……张 颂（49）
- 十三、民国时的水岩坝矿业与伍展明……………凌火金（51）
- 十四、大宁的《兰社》节……………纪华兴（54）
- 封面：贺街文笔……………覃光荣

贺县、信都县解放情况

王思林

1949年10月，湖南衡宝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于11月初发起了广西战役，分兵三路向广西进军。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在广西的各级政权摇摇欲坠。

为配合解放军作战，同年九月底十月初，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李殷丹、中共桂东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黄传林分别在公会的大河水、莲塘永庆、桂岭开山召开重要会议，部署开展武装斗争和迎军支前工作。贺县地下党、游击队迅猛发展，先后在贺县成立了中共贺东、贺西、桂岭、黄公区工作委员会和贺信梧边临时工作委员会，发展地下党员近300人，地下团员200多人。在各区工委的领导下，各地武装组织蓬勃发展。先后建立了贺东、贺西、贺连、贺信梧边、贺信怀边、贺神昭边等九个游击大队和芳林、信都、开山三个独立中队。游击队员2000多人。各区工委派地工人员打入敌人心脏，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对国民党设在八步的平乐专署和设在贺街的贺县县府的情况了如指掌。游击队还把传单和警告信贴到县府大门口，放到各区乡军政人员的办公台上，甚至把警告信放到县长岑孟达的帽子上。游击队四出活动，扫荡敌区，打击敌特分子，使敌人龟缩在县镇据点，犹如瓮中之鳖，成为惊弓之鸟。

1949年11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和一二〇师从湖南道县出发，直插桂东。国民党分散在贺县各地的反动武装，仓惶集结，妄图固守县城，负隅顽抗。

11月20日，贺县民团副团长朱子晖电令驻公会区的一个连火速撤回县城，加强固守力量。连长朱树华接电后，连夜带队抄小路向贺街回撤，公会区区长黄冠辉也随该部往莲塘老家撤退。当他们行至马鼻独山村时，被我游击队哨兵发现。贺西游击大队中队长陈灵启接到哨兵报告后，即率队员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截击敌人的准备。此时，正值农历十月初一，大地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当敌人走到灵敬宫前的水圳边时，中队长陈灵启一声令下：“打！”几十名队员一齐向敌开火。敌人一时摸不清我方兵力，趴在地上，以田基作掩体，毫无目标地乱打一阵，不敢前进一步。半小时后，敌兵纷纷跳入水沟，企图沿水沟逃跑，我游击队员迅速冲上前去，把敌兵一个个从水沟中抓起来。仅一小时，战斗胜利结束。俘敌连长朱树华、公会区长黄冠辉以及士兵二十多人，缴获步枪二十余支，手榴弹一百多颗，我方无一伤亡。

大军威压县境，敌人惊恐万状。11月21日，天刚拂晓，驻八步平乐专署军政人员和保安部队分兵两路撤离八步。一路由营长黄超展带一营的兵力，护着专员虞世熙，开着两辆满载物资和机关文件的汽车，押着十一名所谓“政治犯”，沿八步至公会公路往西撤退。当他们到达道石乡时，被芳林、道石、沙田等乡游击队截击。敌人丢盔弃甲，四处逃命，专员虞世熙慌忙弃车，趁混乱逃至山上，抄小路往钟山的金鹅、六户方向逃窜。我游击队紧追不放，在钟山羊头乡与其它游击队配合将其残部歼灭。除虞世熙和少数人漏网外，

大部敌兵被歼灭、俘获。缴获汽车两部，武器弹药一批，解救了汤有雁等十一名所谓“政治犯。”

另一路由营长李干民带领一个营的逃敌，企图避开游击队的监视，从厦良过浮桥，沿栗木往昭平方向逃窜。我桂东人民解放总队参谋长马伟得到情报后，即率贺西游击大队火速赶到丛虎岭埋伏。此处三面石山环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中午11时，当敌人进入埋伏圈时，游击队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一齐向敌人开火，无枪的群众则在山上烧放电光炮助威。一时枪声大作，震耳欲聋，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利用精良武器抢占地形，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多次组织突围，均被游击队击退。经六小时的激烈战斗，天将黄昏，在游击队强烈的火力和政治攻势下，敌人无计可施，只好缴械投诚。此次战斗，俘敌营长李干民、连长李国威等官兵120余人，缴获机枪七挺，步枪100多枝，各种子弹一万多发，我游击队员陈宏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1月21日，我南下解放军从湖南河路口进入广西。此时，国民党平乐专署大部份军政人员已闻风撤离八步。贺县县长岑孟达也在警卫的护送下，逃离了贺县县城。贺县民团副团长朱子晖困在县城，处于四面楚歌之中，我地下党联络员苏明宗于当天中午从八步驱车到贺街向朱子晖通报了我方提出的要求和四项条件：（一）驻贺县的国民党武装必须放下武器向解放军和游击队投诚；（二）保护好贺街浮桥，不容破坏；（三）维持好当地治安秩序；（四）派出一名代表到莲塘与解放军谈判。朱子晖见大势已去，不敢违抗，答应了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命其驻扎在马练界待命的部队投诚，并找来警察局长执行保护贺街浮桥和维持地方秩序的任务，派出

军事科长张适潮为代表与苏明宗一起到莲塘与解放军、游击队谈判。接着解放军先头部队与苏丹率领的贺东第七游击大队一道向贺街进发，下午五时进驻贺县县城。同时，贺东区工委负责人陈林祥、黄文韶率贺东第五游击大队进驻八步。11月24日，朱子暉按谈判协议率贺县民团向贺东游击队投诚，交出各种枪枝1200多枝，民团士兵经教育后遣散回家，至此贺县宣告解放。

八步、贺街解放后，贺县民团营长岑育斌带一个营的兵力逃回大宁老家，安营扎寨，妄图重整旗鼓，继续与人民为敌。贺连人民解放大队负责人陈瑞田、孔祥寿等人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力量，筹集枪枝，准备与岑育斌决战；另一方面做好统战工作，从中分化瓦解敌人营垒。岑育斌见势不妙，终于在11月27日向游击队缴械投诚，交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四挺，步枪八十多枝，子弹一万多发。

贺县解放后，人民解放军马不停蹄，继续南下追歼逃敌。国民党信都县军政人员闻风丧胆。县长严海燕率该县自卫总队一部逃至聚福乡大平村地主龙百万家，留下两个分队在县城固守警戒。信都县地下党负责人谢上昭在蝴蝶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集结地下武装，解放信都问题。并写信给信都县自卫队队长陈祥林、中队长陈振惠，劝他们投诚。经过做思想工作，陈祥林、陈振惠于11月24日率一百七十名自卫队投诚。26日，谢上昭在云津乡召集各乡地工人员及陈林祥的部份投诚人员进行整编，成立了信都人民解放中队。27日上午，信都人民解放中队进驻县城，宣告信都县城解放。

为解决集结在聚福乡龙百万家的县自卫队残余势力，信都人民解放中队向严海燕发出最后通牒，要他立即放下武

器，接受我方提出的条件。次日，贺信怀边游击大队长何日先率该大队390人抢赶到信都与信都解放中队会师。严海燕见势不妙被迫在谈判协议书上签了字，并交出轻重机枪三挺，步枪两百多枝以及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

12月中旬，国民党广西第一行政区保安部队少将副司令、贺县县长岑孟达由其警卫队长李少明率武装人员护送，往广东连山逃跑，由于当时广东已解放，逃路不通，携带妻女折返大宁老家。一天下午，岑部一士兵向游击队报告这一消息。次日凌晨，大宁中队出动三十多人将岑孟达家包围。岑孟达走投无路，被迫向游击队投诚，缴出手枪五枝，子弹千余发。至此，在贺县作恶多端的国民党少将保安副司令当了游击队的俘虏。

贺县、信都解放后，劳动人民扬眉吐气，到处欢声笑语，锣鼓喧天，庆祝解放。但部份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在暗中进行破坏。为维护地方秩序，继续做好迎军支前工作，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于11月22日，成立了八步、西湾人民治安委员会，苏明宗任主任委员。24日在贺街成立贺县人民治安委员会，苏丹任主任委员。27日成立信都县人民治安委员会，谢上昭任主任委员。十二月十五日和十九日，分别成立贺县、信都县人民政府。邓天培任贺县县长，何日先任信都县县长。1951年8月15日，贺县、信都两县合并，沿称贺县。此后，贺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贺县走向新的征途。

原平乐专区第一个 农业生产合作社

——狮子岗农业生产合作社

莫官济 钟 声

缘 起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分得了土地，获得了生产资料，解放了生产力，生活有所改善。为研究解决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分户单干无力抗拒自然灾害。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平乐地委农村部钟家佐、黄田区委书记吴向田等十多位同志组成工作队，进驻当时由廖隆恩牵头组成的季节性的农业互助组。通过宣传农业的出路必须走合作化道路，在互利互助的条件下，“廖隆恩季节性互助组”，改为常年性互助组，称“廖隆恩”互助组。这是平乐地区贺县狮子岗农业合作社的前身。

建 社

一九五三年二月，党中央要求在一切已经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劳动互助组，条件具备的也可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

平乐地委以“缪隆恩互助组”作为组转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点。经过宣传发动，“缪隆恩互助组”与另外两个季节性互助组合并，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八日，平乐专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狮子岗农业生产合作社诞生了。与当时广西省的蒋在球、莫寿全、滕文经号称捷足领先的四个农业社同负盛名。其时，狮子岗农业生产合作社由户数十一户，四十九人，二十三个劳动力组成。有水田七十一亩，旱地四十亩，耕牛九头，犁十一把，耙八把，水车四架。初级社章程的总则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社员的自留地一般不超过其土地入股数的百分之十。

社员的大农具如犁、耙、谷桶、水车、风车等按质作价入社，分年付本，本清归公，公用公修。

社员的耕牛按当地市价评价入社，保本付息，实行私有公用公养，利息为年利率一分。社员的肥料按质按量作价入社参与分红。其社初建，当年所用种子，由入社户先给社借用，秋后由社分别归还。

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因之，在其当年的农副业总收入中，提取百分之一作为社的公积金。之后，扣除贷款还息、种子、饲料等费用外，按“地四劳六”的比例进行分配。

合作社的生产指挥机构为社务管理委员会，由社员代表大会产生，社干部由社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

急功求成一大二公

狮子岗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一九五三年一年的生产

实践，合作社与单干比，合作社的优越性显然为单干户所望尘莫及。当年显示出的优越性是：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社员积极性，发展了生产。获得了增产增收。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统一使用，解决人力畜力不足的问题，抢上了季节，不违农时。社用公积金增加了投入，增强农业后劲，发挥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由于人、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真正是地尽其力，人尽其用。狮子岗初级农业合作社在当时是贺县合作化的先驱，一面旗帜。县委当时认为该社已具备了转高级社的条件。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狮子岗初级农业合作社扩大到七十一户，二百七十九人，一百一十九个劳动力，五十一头耕牛，水田三百八十一亩五分七厘二，旱地三百四十七亩九分七厘。转为高级社后，以自然村为单位，分成三个生产队，八个生产小组。以田地坐落的自然地域，分成若干耕作区。由社务委员会组织生产、指挥生产。

问题的出现

转高级社后，规模扩大了，一些管理措施尚未配套，新问题不断发生。社员的劳动报酬虽然采取评工记分，按工分计酬的办法，但耕作区与耕作区之间底分很不平衡。为了解决此一问题而采用“三定”办法即定任务、定工分、定时间，进一步严密了生产组织，加强了劳动纪律。但由于社员思想觉悟程度不同，有的不顾工作质量，赶时间、图工分、争报酬，生产效果并不如人所想。继而推行定量、定质、定时、定工，包产量的四定一包制。按各耕作区的面积计划产量指

标和计划用工工分包给各耕作区的各生产小组，实行超减产的奖罚制度。

实行四定一包奖罚制度后，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九五四年全社产量达到二十万斤，较五三年增产八万二千斤，由此对周围的互助组、个体农民影响很大而纷纷要求参加入社。狮子岗高级农业合作社因势利导再次扩社，以原来的户数为基础扩大到四百一十户，一千八百八十人，七百个劳动力，土地三千一百五十三亩六分，分为十九个生产小组，改名安圻农业生产合作社。

一九五五年冬党中央批判了各级干部在合作化问题上“不要过多评头品足，不要像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保守思想”。因此，贺县县委加快了合作化的步伐。在做法上办社干部“包打通天”大力号召农民在合作化会议上表明态度，要其报名入社，自己不愿报的，由社长或互助组长代其报名。到十二月底以该乡狮子岗农业社为中心合并天保堂、竹山脚、新寨、安圻五个社，吸收一些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组成命名曰“五星高级农业合作社”。

五星高级农业合作社共七百一十户，分三十八个生产队，在原五个社的社干中选出十一人组成社务管理委员会，仍然以缪隆恩任社长。下设监察委员会和农业、副业两个部。生产队设三长（一个队长，两个副队长）三员（记分员、保管员和技术员）。

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性质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取消了土地分红，耕牛农具的保本付息。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直至一九五八年转为人民公社。

结 束 语

笔者采访了缪隆恩同志，他说：“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较好和较稳妥的还是互助组时期和初级社的前期。这一期间，真正做到社员入社自主，退社自由”。当时社的规模适当与社的领导能力管理水平相适应。尔后却出现了急躁冒进超越客观规律不切实际的指挥。本来初级社有一个整顿巩固提高的过程而于五四年底就急于转高级社，追求一大二公的形式与规模。一夜之间就轰成高级社违背了农民自愿的原则，以政治运动代替了思想发动。进而出现“浮夸风、掀起共产风”，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值得借鉴。

回忆罗奋平同志

吴 动

罗奋平同志，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贺县中心县委书记，五台军分区连指导员等职。一九四〇年冬，在山西省孟县西烟镇反扫荡战斗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时年27岁，他把青春奉献给人类事业。他出生于公会清泉一个贫苦家庭，幼年在贺县县立27小学读书，时逢上海“五、卅惨案”，反帝怒潮席卷全国。全国学联向全国学校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学生，一致行动起来，声援上海工人斗争，他积极参加公会地区学校员生掀起的反帝、反封斗争，参加集会，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日本侵略”、“坚决取缔日货”等口号，在浩大游行集会的学运中燃起了奋平同志的反帝、反封的烈火。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为国报效，一九三四年考取了广西平乐专署干训队，受训期间，奋平同志他在何德润同志（即贺希明）的启发和影响下，勤奋好学，博览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他涉猎《南昌起义》、《苏维埃运动发展史》、《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接受进步思想，干训队毕业，先后在贺县六小和贺县一小任教，利用讲台向学生讲解了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的罪行，揭露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使学生增强民族观念和无产阶级观念，受

到了民族的、爱国的、阶级的启蒙教育，并对毕业班学生在离校时，鼓励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奋平同志坚决执行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在中共南委和广西省工委的领导下，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和蒋桂系之间的矛盾，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积极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在抗日宣传工作方面，为促进联合抗日，他发起组织“公会各界抗日救国后援会”，成立了宣传队、歌咏队和话剧团，定期出版墙报、画刊、歌唱革命歌曲，公演话剧，大力宣传我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和八路军英勇抗战事迹，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募捐物资，支援抗日前线，并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方面，他除了安排一些同志分头组建抗日武装之外，还利用“金兰结义”的形式与贺、信、梧边界地区有声望的人士，结拜兄弟，这些成员在各自的地区通过社会关系，联络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号召他们支援抗日救国战争，并亲自带领地下党的同志如吴动、黄海波等同志深入瑶山龙槽、宗文等山区观察熟认地形，访贫问苦，交朋结友，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战争形势，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打下坚实基础。

奋平同志是我入党的介绍人和上级，我们在组织上是上下级关系，但在日常交往上完全是兄弟式的同志关系，他俨然像个兄长关怀我的进步，经常鼓励我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我在同他接触中，面聆他对我循循善诱的教诲，目睹他的为人和作风，给予我很深的印象。一九三八年八月，

奋平同志奉命调离贺县去延安抗大学习的同时，我受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派遣去广州，参加中共广东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学习，万想不到，我和他在羊城一别，竟成为永诀。

罗奋平同志，对革命对人民一片赤胆忠心，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刻苦钻研，对同志满腔热忱，爱护备至，生活俭朴，平易近人，是受人尊敬的好同志，好领导，他虽然离开我们已五十年了，但他的崇高品德，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学习和继承的，而他对于我的爱护和关怀，也是我终身难忘的！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缅怀他现作七律一首，以寄哀思！

力挽危亡忆战年，
卢沟烽火漫连天；
提携共抗东师寇，
奋力同宣马列真。
浩气冲霄奔圣地，
沙场浴血洒中原；
羊城一别音容杳，
亮节高风颂万千。

在广西学生军生活的日子里

陈赐珍

我是广西学生军的成员之一。不时回首往事，有的仍历历在目，难于忘却。

一、桂林大集中与学生军的诞生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就开始了。当时我正在武鸣受初中毕业的军事训练，日机经常窜到全国各地进行轰炸，我们的兵营和飞机场有时也受威胁，从那时起，我们天天到郊外上课，挖防空洞。军训结束后，我报名参加了广西学生军，从事于宣传抗日救国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冬，正处在武汉撤退，广州沦陷阶段，桂林是当时广西的省会，也是粤汉线上的交通要站，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和各方面的人员，如潮水般地涌入桂林，桂林一时变成了人山人海，局势变得十分紧张，我们广西学生军就是在这样抗日形势下组建起来的。当时报名考取学生军的共有4800人，分成三个团，团以上成立一个司令部，夏威是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十六集团军的军长兼广西学生军的总司令，受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省主席直接指挥。第一团驻扎在桂林的七星岩、普陀山、月牙山一带岩洞里，时间长达二、三个月。日本飞机天天都来桂林进行轰炸。我们学生军一面训练、一面学习，还兼负警戒和监视附近地区在紧急警报发出的前后有无